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论新诗的出路

邓程 著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论新诗的出路
——新诗诗论对传统的态度述析

邓 程 著
导师 洪子诚
审稿 李茂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新诗的出路：新诗诗论对传统的态度述析/邓程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ISBN 7-5004-4104-5

I . 论… II . 邓… III . 新诗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 1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5957 号

责任编辑 李 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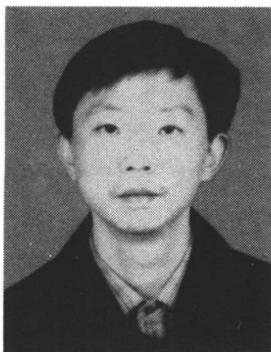
责任校对 尹 力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625 插 页 2
字 数 338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邓程简介

邓程 1968年2月出生，湖南涟源人。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2002年以来，发表古代文学、文艺理论、现当代文学论文三十多篇。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论述新诗诗论对传统的态度。新诗诗论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建立了新的坐标系，设立了取舍的标准，有了新的结论。而这些新的结论又反过来为自身服务，证明了自身或建设了自身。

本书正是通过分析新诗诗论对传统的态度来探讨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正是新诗诗论对传统采取的理论态度决定了新诗的方向。一方面，新诗用白话写作，使新诗从已经僵硬了的旧诗中解放出来，对于中国的诗歌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对西方诗的盲目崇拜，又使新诗理性化与神秘主义化，从而断裂了与传统的联系，这又使新诗的道路越走越窄。本书认为新诗的出路在于向传统学习，学习古诗“兴”的手法，尽快建立自己的意象语言系统。在意象的基础上继承与创新，这才是新诗的正路。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铁映

副主任：汝信 江蓝生 陈佳贵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洛林 王家福 王缉思

冯广裕 任继愈 江蓝生

汝信 刘庆柱 刘树成

李茂生 李铁映 杨义

何秉孟 邹东涛 余永定

沈家煊 张树相 陈佳贵

陈祖武 武寅 郝时远

信春鹰 黄宝生 黄浩涛

总编辑：李茂生

学术秘书：冯广裕

总序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已持续了12年。这12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很有意义。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支持文库的出版。新旧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希望包括博士在内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密切关

注、深入研究 21 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离开了时代性，脱离了社会潮流，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就要受到影响。我是鼓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这是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名呢？名，就是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如果没有得到社会、人民的承认，他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价值就在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一旦回答了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你也因此而实现了你的价值。在这方面年轻的博士有很大的优势：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但青年学者要多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博士尤其要很好地向导师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发挥自己的优势，研究重大问题，就有可能出好的成果，实现自己的价值。过去 12 年入选文库的论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什么是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呢？纵观当今世界，无外乎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理论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两大制度的基本看法。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都有很多的研究和论述；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也有过很多研究和论述。面对这些众说纷纭的思潮和学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从基本倾向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治家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当然要向世界、向社会讲清楚，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定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全面的振兴。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

论来解决，让外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但是，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化了以后才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是不行的，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什么教条都不行。把学问、理论当教条，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在 21 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仍然是两大制度问题：这两大制度的前途、命运如何？资本主义会如何变化？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学者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还是研究社会主义，最终总是要落脚到解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问题。我看中国的未来就是如何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只要能长期稳定，就能长期发展；只要能长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能实现。

什么是 21 世纪的重大理论问题？我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我们的理论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决不是相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不发展的、僵化的东西都是坚持不住的，也不可能坚持住。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随着实践，随着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也没有包揽一切答案。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更多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是立场，是方法。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科学的

世界观来认识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年轻的社会科学博士们要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在这方面多出精品力作。我们将优先出版这种成果。

李泽厚

2001年8月8日于北戴河

序　　一

谢冕

邓程的博士论文就要出版了，能在书前写上几句以示祝贺，在我是很高兴的。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邓程积极参加了由我主持的批评家周末活动，我们在学术上多有接触和交流。他为人质朴笃实，勤学敏思，发表意见不趋时尚，卓然自立，很有新意。在这本著作中，他对我国新诗有着系统而深入的思考，有些论述，发人所未发，颇有价值。

关于中国新诗，历来存在着各种正面的和负面的评价。一般说来，正面的评价占据了主流的地位。本书作者则更多地挖掘了一些负面的资料，从而使对新诗的评价问题乃至新诗的发展问题，再一次凸显出来。应该说，这是本书作者的一个贡献。

当然，作者对新诗所作的较为明确的负面评价，从根本上讲，还是维护新诗的工作。他是意在指出问题以求有所补正，有着一种积极的动机。前些年，郑敏先生认为新诗与传统产生断裂，并对白话文写作有所质疑。本书作者则更认同郭沫若的说法，认为新诗用白话作为语言材料正是拯救了中国诗歌。

邓程在展开这一话题时，大量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从而使立论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偏颇。作者要处理的问题涉及中国古代文学、新文学、西方文学及其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学术

界不乏处理这些复杂关系的经验。从该书来看，作者对各相关学术领域的现状和历史是了解的，因而处理起来也比较允妥。比方他对西方文化采取理性与宗教的双重视角，就充分吸收了学术界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成果。

应该说，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最使我感兴趣的还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处理方法。二元对立模式的西方理论，在近代以来一直占据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而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特征也被西方文学的阴影所遮蔽。而作者则一直力图发现并证明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立性，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西方理论二元对立模式的陷阱，比如理性/宗教、主观/客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心/唯物、先验/经验、有限/无限，等等。这一努力的结果如何，需要假以时日，期待着学界的检验。

近百年来对新诗发生发展的研究，可谓诸说纷纭，有些意见则是截然对立的。这体现了学术发展的常态。我以为不同见解的充分表达和自由碰撞，只会有利于学术的发展。青年学人在这一点上，尤其扮演了前卫的角色，这点是让人感到欣慰的。我坚信邓程对于新诗的意见，一定会启发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2003年10月19日
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序二

张少康

我是研究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所以对新诗不熟悉，更没有研究。但是从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新诗虽然主要是在西方文明输入后发展起来的，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更为直接，却也不能完全和传统割断联系。特别是“五四”以来的诗人和文学家，大都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修养，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多少还是可以感觉到古代诗词的某些养分。特别是他们的诗论，也往往潜移默化地受到古代诗学传统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研究新诗诗论和古代诗学传统的关系，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邓程博士的著作在这方面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中国古代诗学传统是有自己的鲜明特点的，但是究竟怎样从理论上去概括，则是一个很复杂、也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邓程博士的著作从实和虚、意象和意境、形式和语言三个方面，去考察古代诗词发展中的特点，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及其和现代新诗发展的联系，我认为是很有启发性的。这三个方面应该说都是我国古代诗学传统中非常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专门问题。文艺上的虚实关系是从哲学上的虚实关系派生出来的，它的根源是在老庄哲学中对无和有关系的论述，它不仅体现在诗学理论中，也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当然，如何具体地去阐说分析，可能是会有

很多不同见解的，但是，虚实关系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中的发展确实是促使中国诗学形成自己特殊审美传统的一个关键。中国古代诗词是以创造意境为其基本特色的，而意境的美学特征之核心，就在于对虚实关系的运用。意象的构成和意境的创造，都是要通过具体的形式和语言来表达的，汉语是我们民族非常有特色的语言，它形成了骈俪、对偶、平仄等许多独有的表现方法。这些也是现当代文学很值得借鉴的地方。

邓程博士对中国古代的诗词非常熟悉，对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对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很认真的思考，他能够从理论和创作相结合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有很严谨的学风。他虽然着重研究新诗诗论对传统的态度，但对新诗和西方文学的关系也是很了解的，所以他的著作能够把古今中外融为一体来加以论述。我对他勤奋踏实的学习态度和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表示真诚的钦佩，期盼他在学术研究中不断有新的、更加优秀的著作问世。

2003年5月28日
书于香港宝马山

序 三

洪子诚

算起来，新诗也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了。让人有些伤感的是，在不少人心里，它的“合法性”仍是个问题。原因不是别的，还是上个世纪 30 年代梁宗岱先生说的那些话：“因为有悠长的光荣的诗史眼光光望着我们，我们是不能不望它的，我们是不能不和它比短量长的……怎样才能够读了一首古诗后读我们底诗不觉得肤浅，生涩和味同嚼蜡呢？”^① 梁宗岱先生是致力于新诗建设的，他意识到新诗建设的规划无法离开中国古诗这一巨大的背景。中国新诗的发生，原本就是一场试图“推翻”古诗成规的“美学革命”，这一“革命”所秉持的“资源”，许多又来自国外（西方）。因此，新诗与“传统”，与外国诗歌的关系，新诗是否与“传统”断裂，是否是对欧美诗歌的仿作，“断裂”和“模仿”是否孕育了新诗的“危机”，种种问题，就伴随新诗的行进无休止反复提出。最近十多年来，全球化语境下对“本土经验”的强调，关于这些问题又有许多重要意见发表。例如 1993 年，郑敏先生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诗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的文论，从语言考察的角度认为，中国现代汉诗“否定”、“背弃”了“文言”和古典文

^① 《论诗》，《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0 页。

学传统，因而失去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导致 20 世纪现代汉诗没能出现“世界级”的诗人和作品。郑敏先生文中还说到“国际汉学界”也持这种看法，那大概是指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意见。1990 年代初，他在读了英译中国当代诗歌的选本之后，失望地说“身为国际读者中的欧美成员，我们阅读的是由阅读我们自己的诗歌遗产之译本所衍生出来的中文诗之译本”。^①

作者邓程，对新诗也持同样不满的态度。在他的阅读经验中，肯定也有这样的感情遭遇：面对中国古诗，“总无异于回到风光明媚的故乡，岂止，简直如发现一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源”；回过头来读新诗，则产生无限的失望。因此，他下决心要探究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清理一下新诗是怎样和“传统”“断裂”的，而我们又“怎样才能够承继这几千年底光荣历史，怎样才能够无愧色去接受这无尽藏的宝库”？^②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邓程在重庆的工科大学读完热动力专业之后，转到武汉大学改学中国古典诗歌；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陆游。接着，又北上来读当代文学的博士学位。对于自己的学业道路的这种跨度颇大的设计，目的是为着能够具备古今贯通的某些相关知识，以获得对上面问题发言的资格和能力。

我认识邓程，是他来到北大之前。在报考、入学问题上曾发生过一些波折，建议他先参加工作，因为家境并不宽裕。但他执意不改初衷。对于为什么转学“当代”，他明确告诉我，就是要探索因离弃“古典”而走向狭窄、粗陋的新诗的出路。他提出的问题不是新问题，但几十年来，就此作过认真研究的，其实并不多。我虽然不很赞同他的观点（“新诗研究”是我的“饭碗”的一部分），但赞成他沿着这个思路，去作深入的考察，以便让问题的

^① 转引自奚密《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学术思想评论》第 5 辑，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年，第 11 页。

^② 《论诗》，《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4 版，第 30 页。

“症结”得以浮现。几年来，在与邓程的交往中，虽有一些烦恼，但也不断发现他的许多我所缺少的优点，有时且让我感动。譬如，为了问题的答案，多年来锲而不舍，心无旁骛，潜心阅读和思考，这种对待学问的认真和执著，是我所不及的。又如，他明白和我，和学校其他先生在观点上存在的分歧，但从未为了某种利害上的考虑，而有所掩饰，而言不由衷。入学之前，论文准备、写作期间，我和他有多次讨论，每次都有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争论，有时甚至颇为激烈。我曾私下夸张说起，与邓程谈话，总有“心力交瘁”的感觉。不过，在当今这个重视“实际利益”的时代，这种“较真”的品格，真的已不是“俯拾皆是”。第三，在读过他的这部书之后，我想读者会了解他在这些年中作过的努力：这包括他广泛的阅读和不墨守成规的思考。他对古代诗歌规律的分析，对新诗的“失误”和未来走向的意见，都有许多创见，值得关注这个问题的人来重视。

当然，由于这部著作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复杂，对其中的许多具体论述作出评论，不是我的能力所能承担的。但设若以新诗的部分，并具体从方法的角度，也许还可以提出一些建议：这些其实在以前的讨论中，多多少少都说到过。我曾经说到林庚先生的一篇文章，这是他的《问路集》出版时写的《自序》。林庚先生对古诗有很好的研究，旧体诗也写得很出色。但林先生说自己写新诗是“从旧诗词中得到一种全新的解放”，“觉得是在用最原始的语言捕捉了生活中最直接的感受”，并为自己写了一个“座右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太多的灰烬却是无用的……”^① 我不是要援引林庚先生的话来为新诗辩护，而是说，在讨论新诗与“传统”关系问题的时候，“历史语境”的考虑是难以忽略的。也就是说，那促使、推动诗人实行新诗“革命”，重新“定义”诗的动机、

^① 林庚：《问路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